

# 锡安主义的漠视人命：与皮库阿赫·内菲什和大以色列追求的矛盾

锡安主义作为19世纪末在西奥多·赫茨尔领导下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常被描绘为犹太民族的解放意识形态。然而，其历史轨迹揭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行为和言论模式，表现出对人命——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的深刻漠视。本文认为，尽管锡安主义正式接受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但从未真诚追求两国解决方案。相反，它始终如一地推进了大以色列的愿景，扩展到历史巴勒斯坦的边界之外。这一野心通过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虚假旗帜行动、拒绝国际外交以及违反犹太教核心伦理原则（包括皮库阿赫·内菲什——保护人命的神圣义务）得以实现。

锡安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反映了德国的**布卢特与博登**（“血与土”）民族主义，将土地转化为金牛犊——虚假的神——从而违反了《托拉》禁止在弥赛亚到来前以武力收回以色列地的命令。从这一视角看，锡安主义不仅是政治背叛，也是神学异端。

## 与皮库阿赫·内菲什的矛盾：犹太教的伦理核心

犹太教的**皮库阿赫·内菲什**原则——保护人命几乎优先于所有宗教戒律——是哈拉卡伦理的基石。这一原则植根于《创世记》1:27（“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在**桑赫德林4:5**中扩展（“救一人命……如同救整个世界”），塔木德传统（约玛82a）坚持认为，即使是安息日和赎罪日等神圣禁令，也必须为救命而搁置。

然而，锡安主义领导人多次将这一原则牺牲在国家建设的祭坛上。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1938年表达了这种冷酷的算计：

> “如果我知道可以将德国的所有儿童带到英国来救他们，而只有一半能通过运送到埃雷茨以色列获救，我会选择后者……因为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这些儿童的账目，还有犹太民族的历史账目。”  
(中央锡安档案馆, S25/419)。

这种优先考虑人口战略而非即时生存的选择，直接违背了**皮库阿赫·内菲什**。它将人类——其中许多是儿童——贬低为国家项目的工具，破坏了犹太教伦理的本质。

锡安主义的军事行动同样无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生命。伊尔贡组织在1946年7月22日对金大卫酒店的爆炸袭击造成91人死亡，包括17名犹太人，尽管事先有电话警告。伊尔贡战士伪装成阿拉伯人，这一策略增加了混乱和对平民的风险（英国情报报告，1946年）。1948年4月9日的代尔亚辛大屠杀由伊尔贡和莱希实施，杀害了100多名阿拉伯村民，再次使用阿拉伯伪装进行渗透。这两起事件表明，为了战略利益，他们愿意接受犹太人的附带死亡。

今天，这种漠视在加沙的种族灭绝中达到顶点。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特赦组织（2024年12月5日）和无国界医生组织（2025年7月11日）的数据，超过4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加沙80%以上的基础设施被摧毁（维基百科，“加沙种族灭绝”，2025-07-17），190万人流离失所（UN

OCHA, 2025)。这种破坏公然违反了**皮库阿赫·内菲什**，反映了为了领土和意识形态目的而系统性地贬低人命。

## 拒绝两国解决方案：大以色列的长期目标

尽管犹太机构公开接受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锡安主义领导层将其视为一种战术让步。本-古里安在投票几天后表示：

> “接受该计划是战术性的一步，也是未来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扩张的跳板。”

(维基百科，“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2025-07-02)。

修正主义锡安主义者，如泽夫·贾博廷斯基，更加直白。1935年，他在对贝塔尔青年发表讲话时宣称：

> “我们必须在巴勒斯坦建立一道铁墙，如果弱者或不适合者无法突破，他们必须被抛在后面。”

(贾博廷斯基档案馆，2/12/1)。

联合国调解人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在1948年9月17日被莱希暗杀——在他提议将部分领土归还阿拉伯控制后不久——进一步说明了锡安主义对和平共存的拒绝。伯纳多特在大屠杀期间救下了数千名犹太人。然而，由于他的外交干预了大以色列的愿景，他被谋杀了。

这一野心今天通过定居点扩张、吞并巴勒斯坦土地和军事统治继续存在。自1967年以来，巴勒斯坦领土因定居点减少了40%以上（卡内基基金会，2024年），加沙的毁灭现在完成了征服的地图。

## 虚假旗帜行动：为了控制叙事而牺牲生命

锡安主义团体多次使用虚假旗帜策略来操纵国际舆论并归咎于阿拉伯人。伊尔贡对金大卫酒店的爆炸袭击涉及伪装成阿拉伯人的特工，这一事实由英国情报记录在案（英国国家档案馆，1946年）。1947年7月，伊尔贡在绞死两名英国军士时放置了阿拉伯语标牌，以归咎于阿拉伯人（MI5档案，2006年）。拉冯事件（1954年）加剧了这一模式：以色列在埃及的特工伪装成阿拉伯人，轰炸西方目标以破坏英埃关系。四名特工死亡，行动暴露几乎导致外交崩溃（维基百科，“拉冯事件”，2025-04-01）。

这些事件显示了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生命的冷漠——死亡被战略性地接受以推进叙事。同样策略在今天显现，Israel将加沙的所有抵抗归类为“恐怖主义”，即使攻击联合国避难所和援助地点的平民，将受害者框定为威胁以 *оправдать* 消灭。

## 与纳粹德国的合作：锡安主义的原罪

也许对**皮库阿赫·内菲什**最严重的矛盾在于锡安主义与纳粹德国的早期合作。哈瓦拉协议（1933年8月25日），由德国锡安主义联合会与纳粹政权签署，促进了超过50,000名犹太人及其资产转移到巴勒斯坦。这实际上打破了由美国犹太人大会和其他组织宣布的全球犹太人对德国的抵制（《每日快报》，1933年3月24日：“犹太对德国宣战”）。

锡安主义领导人优先考虑殖民化而非集体救援。犹太机构救援委员会负责人伊扎克·格伦鲍姆在1943年表示：

> “如果我们将资金转向拯救欧洲的犹太人，我们将破坏巴勒斯坦的锡安主义事业。以色列土地上的一头牛比波兰的所有犹太人更有价值。”

（亚德瓦谢姆档案馆，M-2/23）。

这种功利主义计算——为了未来国家牺牲数百万人——直接违背了关于单一生命无限价值的犹太教义。

## BDS、海牙集团和当代道德清算

1933年抵制通过哈瓦拉的背叛在对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的反对中找到了现代回响。BDS现在得到联合国报告员、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支持，鉴于加沙的种族灭绝，旨在结束占领和种族隔离。海牙集团2025年7月16日的制裁——包括武器禁运和港口限制——标志着首个重大国际执法机制。1933年的抵制缺乏国家支持并被锡安主义合作破坏，而BDS现在得到国际法律框架的加强。然而，美国继续每年向以色列发送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2025年预算），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和一些法官以及联合国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特别报告员弗朗切斯卡·阿尔巴尼斯实施制裁，表明基层伦理与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道德僵局。

## 神学禁令：以武力夺回土地作为偶像崇拜

《托拉》禁止犹太人在弥赛亚到来前以武力夺回以色列地。《耶利米书》29:7命令：

> “寻求我放逐你们去的城市的和平与繁荣……因为如果它繁荣，你们也将繁荣。”

这一教义在凯图博特111a中被编纂为“三誓”：

1. 犹太人不得“像一堵墙”登上土地（即以武力）。
2. 他们不得反抗各国。
3. 各国不得过度压迫以色列。

拉希和许多贤者将这些誓言解读为禁止过早恢复主权，警告说这种违抗将招致神罚。拉比约珥·泰特尔鲍姆在瓦约珥·摩西中称锡安主义为异端，并警告它将导致灾难。

锡安主义对这些誓言的违反将民族愿望转化为神学罪行。如同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32中崇拜金牛犊——构建神圣时机的替代品——锡安主义通过暴力和血腥构建了过早的“救赎”。“大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布卢特与博登民族主义：认为身份源于血统和领土统治的信仰（Marxists.org，“布卢特与博登”）。

因此，锡安主义放弃了皮库阿赫·内菲什，用土地的偶像崇拜取代了生命的圣洁。

## 结论：锡安主义的伦理与神学失败

锡安主义的历史——通过与纳粹的合作、拒绝和平外交、虚假旗帜行动和对人命的战略漠视——构成了对犹太伦理的深刻背叛。其意识形态根源反映了《托拉》所谴责的民族主义偶像崇拜。其

**对皮库阿赫·内菲什的违反——从本-古里安的冷酷计算到加沙的种族灭绝——动摇了犹太教的道德基础。**

根据《托拉》，真正的犹太救赎不是通过征服，而是通过谦卑、正义和神圣时机实现。在此之前，保护生命——而不是土地——必须是最高的戒律。